

资源、社会与仪式选择： 早商都邑占卜活动新研*

张 飞

【摘 要】文章在资源与社会的视角下，对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两处早商都邑内占卜活动的关键要素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研究表明，两处都邑占卜用材的选择既深受遗址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也受到当时生态系统的限制。两处都邑在占卜方法的演变历程上保持着同步性，在操作程序上具有高度同一性，但与夏代的占卜方法存在显著差异。对占卜地点的空间观察显示，早商都邑占卜活动的功能或目的具有较为突出的一致性，均表现出强烈的经济指向性，并且这一特征在夏代就已出现。早商都邑占卜活动是生态系统、资源获取能力与社会变革形势共同制约、相互影响的结果，是认识早商社会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早商都邑 占卜 资源获取 社会变革 仪式选择

【作者简介】张飞，考古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6) 04-0116-16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器生产与消费综合研究”(25CKG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启计划”“仪式人类学视角下的先秦占卜实践研究”(2026QQJH38)资助。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曾与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王钧湛，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鲁紫璇、陈胤龙，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丁煜晖等学友交流讨论，收到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在复杂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仪式始终是消融社会矛盾冲突、塑造社会结构、构建政治权威的重要手段。^① 人类学对仪式的界定，于狭义上仅指“与宗教有关的教义陈述、祭祀、仪礼、庆典、礼拜活动等”，而于广义上则指一切“社会化的、群体认可的重复行为和活动”。^② 考古学关注的仪式范畴更接近前者，通常包括祭祀、丧葬、宴享、占卜等活动。^③ 具体到早商时期，^④ 此前的仪式考古研究主要关注祭祀、丧葬两类活动，^⑤ 近年来宴享活动也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⑥ 相比之下，学界对早商时期的占卜活动则关注甚少，已有研究多从器物学角度考察卜骨的用材、整治方式、钻凿灼形态，进而总结其演变规律，^⑦ 并未进一步探究占卜活动背后深层的资源与社会动因。实际上，仪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多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相

-
- ① 参见[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3~147页；[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 ②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1、23页。
- ③ 参见[美]傅罗文、陈伯桢：《古代中国内陆：景观考古视角下的古代四川盆地、三峡和长江中游地区》，戚轩铭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276~279页。
- ④ 本文所论的早商时期指考古学文化中的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早段至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晚段。参见唐际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第393~420页。
- ⑤ 参见郜向平：《商系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明东：《商周墓葬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谢肃：《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曹艳朋：《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商代祭祀遗存之比较》，《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43~44、47页；桑栎、陈国梁：《偃师商城几种丧葬习俗的探讨》，《考古》2017年第4期，第65~76页；张煜珖：《夏商周祭祀遗存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9年。
- ⑥ 参见Anne P.Underhill, *Craft Produc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ern China*,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02; Constance A. Cook, *Moonshine and Millet: Feasting and Purification Rituals in Ancient China*, in Roel Sterckx, ed., *Of Tripod and Palate: Food, Politics, and Religion in Traditional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p.9-33; Katrinka Reinhart, *Ritual Feasting and Empowerment at Yanshi Shangcheng*,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Vol.39, 2015, pp.76-109.
- ⑦ 参见徐基：《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的初步研究》，《文物》1995年第6期，第47~52页；王华：《济南大辛庄遗址出土甲骨政治技术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朴载福：《先秦卜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李雪山、韩燕彪：《嬗变与重构：商代甲骨占卜流程与卜法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

互制约的产物。要更为完整、深入地认识仪式，必须充分考虑特定时空内的自然环境、资源网络以及社会图景。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最为重要的两处都邑遗址，是探讨夏商分界与夏商族群关系、商王朝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商王朝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不可绕过的关键坐标。然而，二者虽均属都邑性遗址，但在功能、等级上差异显著。单就都邑规模来说，偃师商城面积不足200万平方米，^①而郑州商城面积初步推测约1300万平方米，^②前者仅占后者的约1/6。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郑州商城为主都、偃师商城为辅都或陪都的观点。^③由于等级与性质上的差异，两处遗址在资源获取能力上的不同也随之产生。当前的考古发现表明，相较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在青铜礼器、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等稀缺资源的使用上有着明显优势。^④此外，两处遗址均处于夏商变革的关键时期，其文化习俗与制度系统必然受到夏商族群互动模式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在考察占卜活动时，一方面关注两大都邑内占卜要素的异同，另一方面注重夏商都邑内占卜要素的对比，并尝试从资源获取与社会变革的角度解释各类仪式要素被选择乃至被重组的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占卜活动作为仪式行为的一种，通常也由用材、方法、时间、地点、成员、目的等要素构成，基于考古材料自身的特点，我们的研究将集中讨论占卜用材、占卜方法、占卜地点三大要素。

一、占卜用材与资源背景

仪式用材是仪式得以开展的基础，是仪式执行者与仪式对象之间重要的连接纽带。^⑤仪式用材的选择既是社会认同的产物，也受制于资源获取能力与自

① 参见陈国梁：《都与邑——多重视角下偃师商城遗址的探究（上）》，《南方文物》2021年第6期，第11页。

② 参见袁广阔、曾晓敏：《论郑州商城内城和外郭城的关系》，《考古》2004年第3期，第66~67页。

③ 参见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3~79页；潘明娟：《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第55~63页。

④ 参见孙明：《稀缺资源视角下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对比研究——以青铜礼器、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为例》，《中原文物》2023年第5期，第51~59页。

⑤ 参见杨谦：《仪式与社会：商代晚期祭祀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第84页。

然生态状况。全面考察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占卜活动的用材情况，并将之与夏代都邑——二里头遗址^①进行比较，不仅有助于认识两大都邑的等级与性质差异，而且可以进一步揭示不同时代仪式用材选择背后的资源与社会动机。

偃师商城遗址出土的早商时期卜骨总数为100片，用材主要是牛、猪、羊三类动物的肩胛骨。^②李志鹏、袁靖等对部分发掘者未特别收集的卜骨进行了种属鉴定，其中牛肩胛骨38片、羊肩胛骨2片，前者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③此外，笔者也在专业动物考古学者的帮助下，对发掘报告中已公布的卜骨线图进行了重新辨识。在可鉴定种属的卜骨中，牛肩胛骨计有13片，猪肩胛骨2片，羊肩胛骨仅1片。^④总体来看，偃师商城的卜骨用材以牛骨为主，猪骨、羊骨占比均较低。郑州商城出土卜骨数量众多，保守估计在千片以上，^⑤其中仅1952—1953年便出土卜骨787片，但目前只对1953年出土的卜骨进行了用材种属的详细统计。其中，牛骨占比约为82%，具有绝对优势，猪骨占比约为9%，羊骨占比约为5%，龟甲占比约为3%，鹿骨占比约为1%。考古发掘报告虽未基于郑州商城卜骨总数进行种属统计，但对各期的卜骨用材

-
- ① 夏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学者均将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纳入夏代纪年的考虑范围。参见贺俊：《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第85~94页。
-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9、817~829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2018~2020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2022年第6期，第3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一”字形水道与新西门发掘简报》，《考古》2023年第12期，第37页。
-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59页。
- ④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1~705页。
- ⑤ 参见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2期，第86页；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编著：《郑州二里冈》，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8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681~683、834~836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城市考古与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郑州商城遗址内城西南角商代灰坑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2年第5期，第33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商城遗址塔湾古街片区IV区商代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5年第4期，第32页；孙丽萍、宋振民、田宁宇：《商都新识：郑州商城书院街北片区商代遗存》，《大众考古》2025年第7期，第24页。

有较为清晰的统计与描述。关于二里岗下层一期的卜骨用材，报告称“以羊肩胛骨的数量为多，并有一些猪肩胛骨和牛肩胛骨”。^① 在二里岗下层二期的卜骨中，牛骨的占比约为53%，羊骨占比约为31%，猪骨占比约为7%，龟甲占比约为9%。^② 至于二里岗上层一期，共出土卜骨111片，其中牛骨、猪骨、羊骨、鹿骨四类卜骨占比约为67%（牛骨占比最高），龟甲占比约为33%。^③

对比两处商代早期都邑的占卜用材，可知两处都邑的卜骨用材均以牛肩胛骨为主，羊与猪的肩胛骨少量存在。然而，郑州商城自二里岗下层二期起便尝试使用龟甲占卜，到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时，龟甲在卜用甲骨中的占比更是达到了约33%，而偃师商城在整个二里岗时期并未发现使用龟甲占卜的实例。至于龟甲，无论是甲骨文研究还是近来科技考古的溯源分析，皆表明有商一代黄河流域所见的大量龟类遗存少有于本地生产者，而是有着广阔区域内的多种来源，尤其是长江流域应在较长时期内作为其主要供应地。^④ 在相关的甲骨记事刻辞中，就发现有不少外地贡龟给商王室的记载，数量或在1万件以上。^⑤ 由此可知，龟在商代早期的北方地区属于相对稀缺的动物资源，而郑州商城在这方面的获取能力要明显强于偃师商城。这与考古遗存反映的郑州商城具有更强的资源吸纳与人口掌控能力是相符的。^⑥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在仪式用材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在祭祀活动中也能得到证明。偃师商城发现了大量与祭祀有关的遗存，用牲种类包括人、猪、

-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页。
- ②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681~683页。
- ③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834~836页。
- ④ 参见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第626~636页；王宇信：《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杨娟、姚政权、郭怡等：《安徽阜南台家寺遗址出土龟甲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第四纪研究》2022年第4期，第1132~1133页。
- ⑤ 参见胡厚宣：《殷代卜龟之来源》，《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1944年版，第638页；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第59页。
- ⑥ 参见潘明娟：《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关系看早商的主都和陪都》，《考古》2008年第2期，第60页；孙卓：《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城市发展进程的比较》，《考古》2018年第6期，第91页。

犬、牛、羊、鹿等，其中猪的使用比例最高，犬次之，二者均存在单独且集中埋葬的情况。人通常与动物、植物乃至陶器等其他类型祭品进行合理祭祀，虽分布区域较广，但数量较少。^①除此之外，牛、羊、鹿等动物较少见到完整的骨骼，而只是截取身体某一部分进行祭祀。郑州商城祭祀活动的用牲同样包括人、牛、猪、羊、犬等，在种类上似乎与偃师商城相差不大，但牛牲与人牲的使用情况则显示出一定的特殊性。较之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牛牲的数量更多，在郑州商城西墙外侧甚至发现了若干使用完整牛骨架的祭祀坑。^②郑州商城中人牲的使用也十分常见，人与动物合理、单独使用人牲埋葬已成为郑州商城占据主导地位的祭祀方法。^③郑州商城单次人牲使用数量最多达8具，^④城东北部祭祀场在100余平方米的范围内就发现了14座单人祭祀坑。^⑤郑州商城对牛的利用规模明显超过偃师商城，而牛是能够提供奶制品、畜力等次级产品的重要大型牲畜，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郑州商城比偃师商城拥有更为雄厚的经济积累。此外，相较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对人牲的高频率使用显然是更为强大的征伐能力的体现，而这或许正是其资源获取能力的保障。

同时代更早的二里头遗址相比，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在牛、猪、羊三类卜骨使用比例的次序上与之保持较高一致性，但也存在明显差异。^⑥其一，牛肩胛骨的占比在两处早商都邑中都有了显著上升，猪与羊肩胛骨的比例则

-
- ① 参见王学荣、杜金鹏、李志鹏等：《偃师商城发掘商代早期祭祀遗址》，《中国文物报》2001年8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考古》2002年第7期，第6~8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市偃师商城宫城祭祀D区发掘简报》，《考古》2019年第11期，第15~24页。
- ②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507~510页。
- ③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83页。
- ④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486页。
- ⑤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 ⑥ 参见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文化的占卜制度初探——以二里头遗址近年出土卜骨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2~64页；张飞、李怡晓：《仪式系统视角下二里头遗址占卜活动再研究》，《华夏考古》2024年第5期，第131~132页。

相应下降。此现象早有学者关注到，并将之与商代仪式用牲价值观的整体转向、商王朝国家祭仪制度的形成相关联。^① 笔者认同这一解释，但希望强调，饲养技术与经验的长期积累带来的牛群养殖规模扩大，也是牛肩胛骨在占卜活动中被广泛使用的重要现实基础。其二，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较常见的鹿类卜骨，在两处早商都邑中已极少见或完全不见。这一趋势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卜骨中亦有体现，该期卜骨包括牛骨、猪骨、羊骨三类，同样缺少鹿类卜骨。^② 如将视野进一步拓宽则可以发现，除了两处早商都邑遗址的卜骨缺少鹿肩胛骨，整个二里岗文化时期也仅在柘城孟庄、辉县褚邱两个基层聚落发现用鹿肩胛骨制成的卜骨，其中孟庄遗址仅有1片，^③ 褚邱遗址的数量不清。^④ 有学者对史前至周代卜骨中鹿肩胛骨的占比进行过统计，发现在新石器时代，它的占比约为4.3%，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至3.6%，商代占比竟然只有0.02%，周代更是未见1片。^⑤ 如此大范围出现的随时代衰减的趋势，恐怕不仅仅是文化习俗的选择导致的。相关研究显示，自公元前3000年以来，伴随着牛、羊的引进与农业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野生动物因栖息地被不断侵占而逐渐远离人类聚居地，鹿类亦由此开始退出人类的生活环境和食谱，与人的共生关系趋于瓦解。^⑥ 故此，从长时段的动物资源变迁情况看，商代早期卜骨中的鹿肩胛骨退出历史舞台，应与当时生态系统的变迁有关。

二、占卜方法与族群差异

仪式方法作为仪式的构成要素之一，是仪式通向神圣化的重要环节。排

-
- ① 参见[日]冈村秀典：《商代的动物牺牲》，刘庆柱主编：《考古学集刊》第15集《纪念殷墟发掘七十周年论文专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20~222页。
- ② 参见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文化的占卜制度初探——以二里头遗址近年出土卜骨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5页。
-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商丘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柘城孟庄商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第67页。
- ④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5页。
- ⑤ 参见朴载福：《先秦卜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72页。
- ⑥ 参见[日]冈村秀典：《中国文明：农业与礼制的考古学》，陈馨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106~109页；[加]兰德：《惟王受年：从农业起源到秦帝国的中国政治生态学》，王泽、杨姚瑶译，东方出版中心2023年版，第100~101页。

除生态与技术因素，仪式方法的选择在大多数时候表达的是一种族群意识与文化形态。具体到占卜活动，其仪式方法可根据程序先后分为卜骨整治方法、钻凿灼方法两种。对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与二里头遗址占卜方法的比较，无疑将为进一步揭示夏商族群如何通过仪式方法构建身份认同提供新的思路。

就卜骨整治方法而言，偃师商城用于占卜的肩胛骨，其骨脊多被切割平整，只有极少部分肩胛骨还保留骨脊。对卜骨的整治大致可分为五种：A型未经修理，保留骨脊，该型卜骨极少；B型仅削去骨脊，该型数量不多，主要见于猪肩胛骨；C型保留骨臼、臼角与边缘，削去骨脊，掏挖骨臼下部较厚部分，其边缘呈不规则状；D型保留骨臼、臼角，削去骨脊，削平背面，同时在骨臼下端下切（除部分样本切面不甚规整，多数情况下骨面与骨臼下切面垂直）；E型切去骨臼部分，同时将背面削平。从已公布的材料看，卜骨在偃师商城二里岗文化下层与上层的过渡期开始出现，C型、D型卜骨也于此时出现，以C型卜骨为主。到了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D型卜骨成为主流，C型卜骨仅见少量。^①至于E型卜骨，在偃师商城只发现1片，而且在整个早商时期的其他遗址也未发现该型卜骨，可能为晚期遗存混入所致（见图1）。郑州商城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二期的卜骨主要是A型与B型两种，以B型卜骨为主。到了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卜骨的类型包括B、C、D三种，其中B型卜骨仍多见于猪、羊、鹿的肩胛骨，而牛肩胛骨则主要使用C型整治方法。

在钻凿灼方法上，偃师商城卜骨中猪与羊的肩胛骨上可见先钻后灼、直接灼烧两种形态，牛肩胛骨全部为先钻后灼。郑州商城在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至下层二期时，卜骨均为单纯的灼烧。至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牛肩胛骨的占卜方法多是先钻后灼，而对猪、羊、鹿的肩胛骨，除极少数先钻后灼，大多仍是直接在骨面上进行灼烧。龟甲与肩胛骨相似，同样从二里岗文化上层一期开始采用先钻后灼的占卜方法。^②猪、羊、鹿等动物的肩胛骨之所以长期延续单纯灼烧的传统，主要是因为其骨面较薄，即便不钻孔，也更易因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03~705页。

^② 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31、213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74~175、681~683、834~8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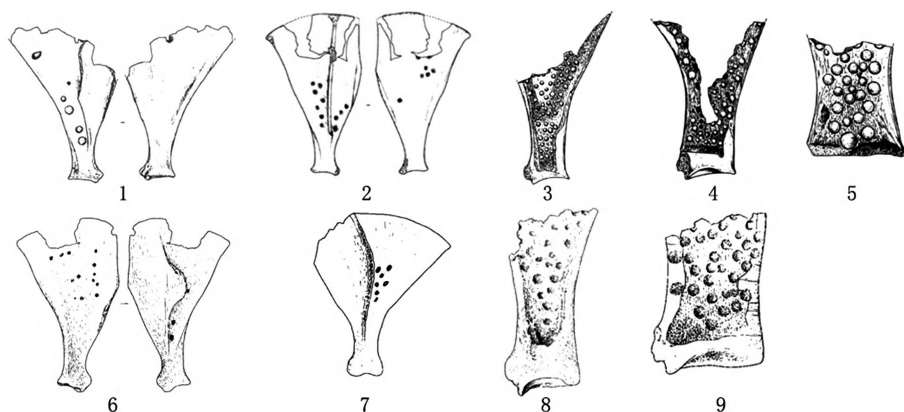


图1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卜骨整治方法

1. A型(1991YSJ2T2H9:4) 2. B型(1992YS IV T31H117:4) 3. C型(1996YS IV T103H 179:1) 4. D型(1983YS VIII T4 ③:22) 5. E型(1992YSJ2T38H20:7) 6. A型(C9.1H105: 15) 7. B型(C7H11:14) 8. C型(C5H120:36) 9. D型(C5.3H311:6)

注: 1~5 出自偃师商城, 6~9 出自郑州商城。

灼烧而显现兆痕。这一认识在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卜骨的钻孔位置上也可得到印证, 两处遗址猪、羊、鹿的肩胛骨上的钻孔位置, 大多位于靠近骨白处的骨面较厚区域。

由此可知, 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在卜骨整治方法、钻凿灼方法的选择上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同步性, 而且在程序与加工细节上有着高度相似性。考虑到技术是构建物质文化面貌最为直接的因素, 更是人群基于自身社会文化边界进行选择性的实践的结果,^①我们就有更加充分的理由认为, 前辈学者关于两处早商都邑内主体族群相同的论断当是准确的。

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卜用肩胛骨, 绝大多数仅对骨板表面稍有整治。整治较甚且先钻后灼的卜用肩胛骨, 全部出土于宫殿区二里岗文化时期的遗迹,^②它们应是二里头遗址衰落之际, 由新入都邑的商人族群带来

① 参见范宗祥:《文化与人群语境下的史前技术研究——技术选择理论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朱岩石主编:《考古学集刊》第30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 第80~81页。

② 参见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文化的占卜制度初探——以二里头遗址近年出土卜骨为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五)》, 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第62~69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二里头:1999—2006》, 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 第146~149页。

的占卜方式的反映。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未曾发现对骨白进行切割或锯除的卜骨，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就占卜方法而言，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卜骨基本仅有灼烧痕迹，只偶尔可见简单的施钻灼烧现象，与二里岗文化时期普遍使用钻灼并行的占卜方法判然有别。

对卜骨的整治，一方面可以使卜骨区别于日常生活中所见的肩胛骨，强化其神圣性；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扩大骨骼表面用于占卜的区域。占卜时先钻后灼，可以让待灼的骨面先变薄，进而大幅缩短显现兆痕所需的时间，提高占卜效率。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商人在卜骨神圣化、卜骨利用率、占卜效率等方面较夏人要更进一步。

三、占卜地点与仪式目的

仪式是一项具有情境性的实践，特定的仪式空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故仪式地点是判定仪式重要性的关键依据。^① 考古学是关注时间与空间的学科，因而仪式地点是考古研究中最受关注也是最易辨识的仪式要素之一。仪式地点的选择不仅直接关系到对仪式目的与仪式群体的考察，还直接反映了仪式的结构性与反结构性。^② 围绕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以及二里头遗址占卜地点、祭祀地点展开分析，对讨论遗址性质、族群属性及社会变革等引发的仪式目的与仪式群体差异具有重要意义。

偃师商城已公布出土位置的卜骨分布区域极不均衡，其中约 80% 分布于Ⅳ、Ⅷ两小区，余下少量出土于Ⅱ、Ⅲ、Ⅶ等区（见图 2）。笔者认为，这一空间分布特征应是由占卜背景与目的导致的，需进一步考察卜骨集中发现区域的性质。偃师商城Ⅳ区总体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小城的东北区域与作坊区。Ⅳ区所见卜骨除 1 片位于小城东北区域，其余全部出土于作坊区。作坊区发现了大量陶窑、陶器残次品和制陶工具，是偃师商城内目前

① 参见 Jan A. M. Sneek, Defining “Rituals”, in Jens Kreinath, Jan Snoek and Michael Stausberg, eds., *Theorizing Rituals: Issues, Topics, Approaches, Concept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6, pp.3-14; Joyce Marcus, Rethinking Ritual, in Evangelos Kyriakidis, ed., *The Archaeology of Ritual*, Los Angeles: Cotse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2007, pp.43-76.

② 参见 [英]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40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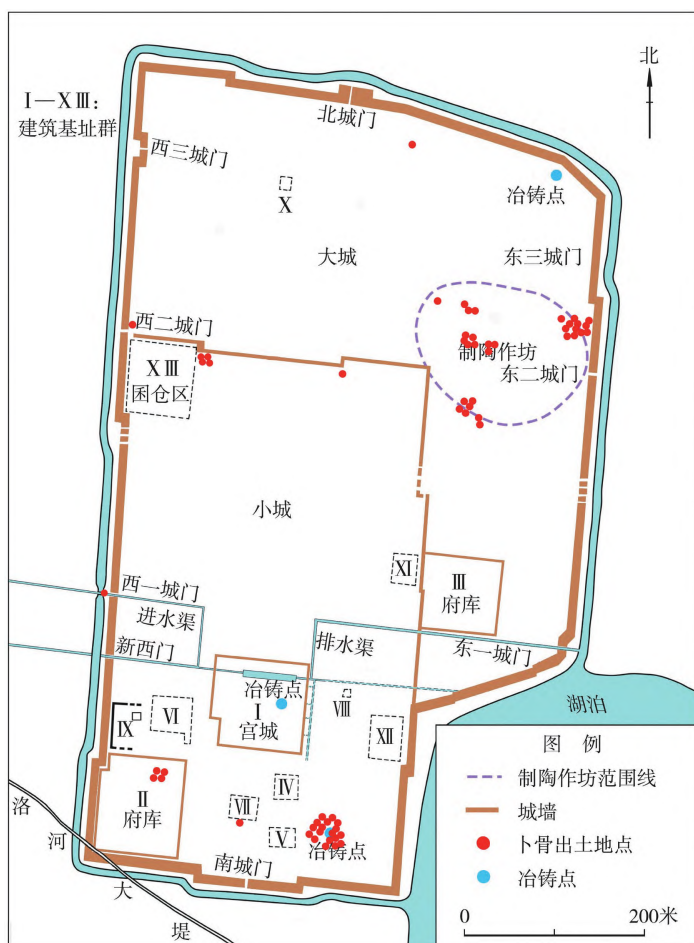


图2 偃师商城卜骨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洛阳市偃师商城遗址2018~2020年墓葬发掘简报》图1（《考古》2022年第6期，第20页）改制。

所见最大一处制陶作坊的所在地。^①除了制陶作坊，在该区域内还发现木炭、铜渣等与铸铜有关的遗存，以及较多的石器生产半成品。^②由此可见，

①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15页；邓玲玲、陈国梁、曹慧奇等：《偃师商城遗址制陶作坊区的产品与布局结构研究》，《江汉考古》2023年第5期，第69~81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东北隅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6期，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偃师商城》第1卷，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22~72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商城IV区1999年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6期，第41页。

IV区应是集制陶、铸铜、石器加工等多种手工业活动于一体的“工业园区”。Ⅷ区位于小城东南部，为偃师商城3处铸铜作坊之一。^①由此可知，偃师商城大部分卜骨的出土背景均与手工业生产有着密切关系，可能与生产活动中预测成功率的仪式有关。正如人类学研究所示，在前工业社会，金属冶铸、陶瓷器生产是最容易受“神灵干扰”，也最需要“外力庇护”的手工业行当。^②偃师商城发现的卜骨年代集中于二里岗文化下层晚段至二里岗文化上层早段，这一时期也正是遗址内手工业作坊最为繁荣的时期。^③至于手工业作坊临近停止生产的二里岗文化上层晚段，目前仅发现1片卜骨。二者在繁荣时段上的共时性，也进一步证实了占卜活动在彼时手工业经济中的重要意义。

郑州商城同样发现大量卜骨，遗憾的是考古发掘报告与相关简报并未公布每片卜骨的出土背景。不过，从可获取背景信息的部分卜骨中，仍可窥探出一些重要信息。郑州商城考古发掘报告与相关简报对42片卜骨的出土位置进行了较详细的记录，经笔者统计，其中约65%发现于宫城南墙与外城之间的C5与C9两个发掘区，即郑州商城面积最大的铸铜作坊——南关外铸铜作坊的所在地（见图3）。^④南关外铸铜作坊的使用时期从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延续至上层二期，其中最为繁荣的阶段当属二里岗文化下层二期至上层一期，^⑤而针对卜骨出土单位的期别梳理亦表明，超过95%的卜骨的年代恰好集中于这一时期。因此，郑州商城的占卜活动很可能与大规模的铸铜生产活动存在密切关联。

① 参见陈国梁：《都与邑——多重视角下偃师商城遗址的探究（下）》，《南方文物》2022年第5期，第12页。

② 参见[美]李安敦：《秦汉工匠》，林稚晖译，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第181~182页。

③ 参见邓玲玲、陈国梁、曹慧奇等：《偃师商城遗址制陶作坊区的产品与布局结构研究》，《江汉考古》2023年第5期，第78~79页。

④ 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1、307~309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编辑部编辑：《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页。

⑤ 参见张文军、张玉石、方燕明：《关于郑州商城的考古学年代及其若干问题》，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1985—1992）》，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杨育彬、孙广清：《河南考古探索》，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74~2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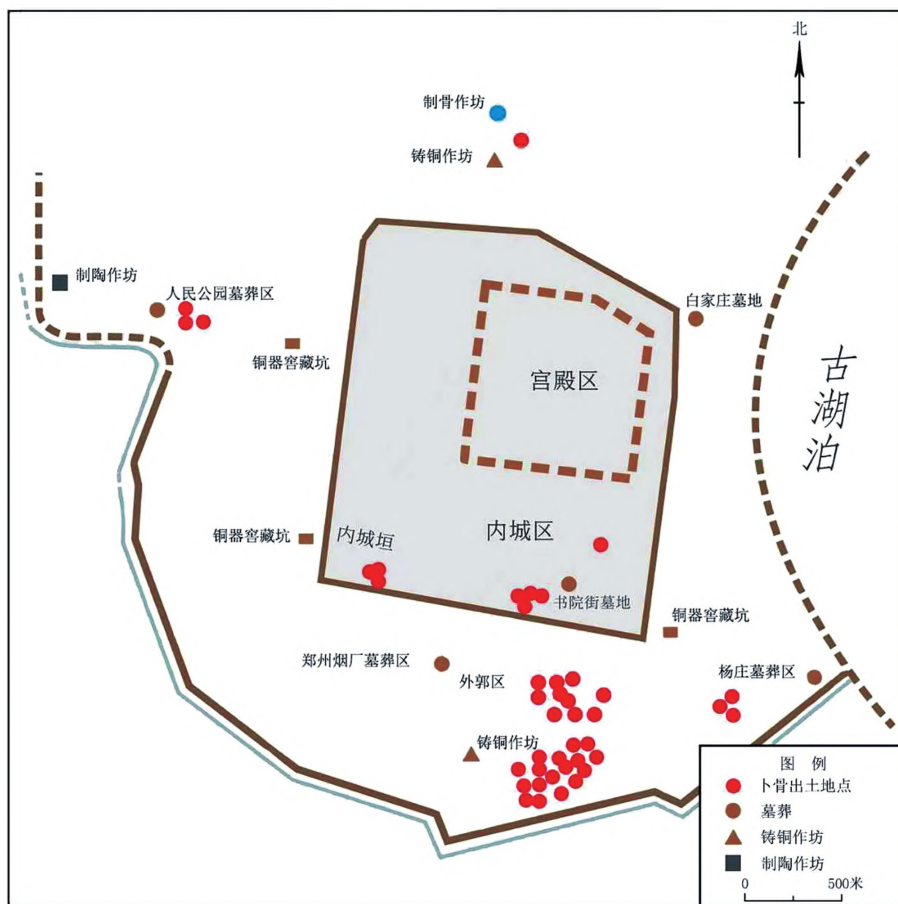


图3 郑州商城卜骨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据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院所供底图改制。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隔洛河相望，时代上前后相继，其卜骨分布状况对思考偃师商城占卜活动的模式与目的具有启示意义。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卜骨的统计分析显示，发现卜骨数量较多的区域主要有两处：一处位于宫殿区4号基址周边，另一处在绿松石作坊内。4号基址是遗址手工业作坊区之外的另一处手工业聚集区，其南侧已发现了1号制骨作坊以及包括部分石料、绿松石料、铜渣等在内的手工业生产遗存。^① 二里头遗址这两处手工业

① 参见赵海涛、张飞：《二里头都邑的手工业考古》，《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第126~128页；张飞、李怡晓：《仪式系统视角下二里头遗址占卜活动再研究》，《华夏考古》2024年第5期，第129~130页。

集中区域的生产时间均始于二里头文化二期，并持续至四期，^①与出土卜骨的时代具有高度同步性。此外，卜骨与生产性遗存共出的概率，经笔者统计更是达到60%~70%。^②二里头遗址二里岗文化时期的卜骨除宫殿区东南角出土2片，其余均分布于宫殿区东部，尤以4号基址周边最为密集（见图4）。这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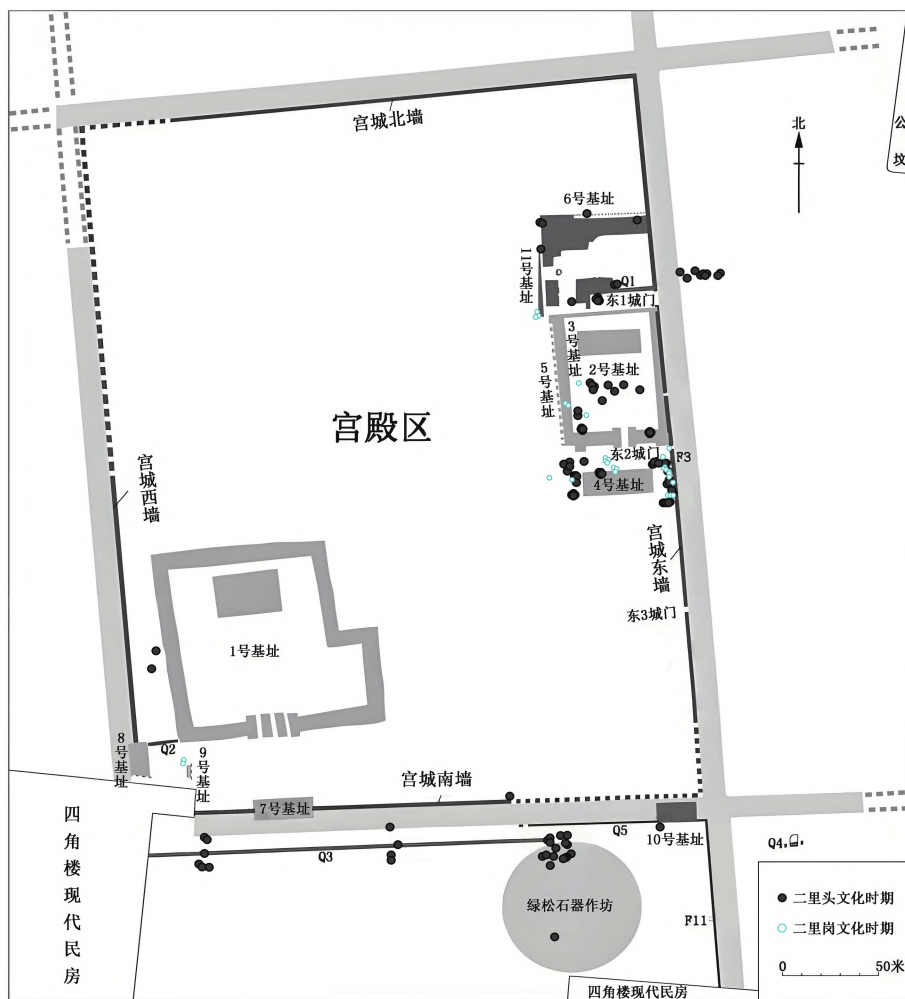


图4 二里头遗址卜骨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仪式系统视角下二里头遗址占卜活动再研究》，第129页。

- ① 参见陈国梁、李志鹏：《二里头遗址制骨遗存的考察》，《考古》2016年第5期，第63~64页；赵海涛：《二里头都邑聚落形态新识》，《考古》2020年第8期，第113~116页。
- ② 参见张飞、李怡晓：《仪式系统视角下二里头遗址占卜活动再研究》，《华夏考古》2024年第5期，第129~130页。

现象是否与商人进入二里头遗址后曾短暂沿用遗址内的手工业生产基地有关,值得进一步考虑。当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表明,周革殷命之后,周人曾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继续利用殷墟遗址的手工业作坊与工匠。^①因此,不排除夏商更迭之际,商人对二里头遗址的手工业采取了类似的利用策略,并在占卜活动方面也深受夏人影响。

从二里头遗址与郑州商城卜骨的分布特点看,偃师商城占卜活动与王国手工业经济密切关联的仪式传统在夏代便已形成,在商代早期的大型都邑内仍延续不断。

四、结语

仪式是一个复杂系统,是多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产物。就仪式用材而言,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虽同为早商时期的都邑性遗址,但由于功能与等级的差异,二者之间存在显著区别。郑州商城卜骨中龟甲这类稀缺物资的使用量远超偃师商城,表明其具有更为强大的资源获取能力。至于早商时期鹿肩胛骨使用量的大幅度减少,则可能是区域生态系统变迁导致的。就仪式方法而言,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在卜骨整治方法、钻凿灼方法上发展历程同步,程序类型基本一致,却明显有别于二里头遗址的占卜方法。究其原因,应是早商人群发展出了一种更具神圣性与效率的占卜方法,从而凸显了与夏族群的仪式区分。就仪式地点而言,偃师商城、郑州商城的占卜遗存分布均表现出与手工业区的密切关系,暗示占卜活动有着明确的经济指向性,并非只服务于政治活动或被上层精英垄断。这一占卜目的或功能上的特殊性,亦见于二里头遗址,是“殷因于夏礼”^②的一种体现。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夏商时期的占卜活动具有一定政治意义,只是强调基于现有材料,占卜在经济活动中的出现频率要高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早商时期,晚商时期的占卜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 参见何毓灵:《论殷墟手工业作坊遗址考古的相关问题》,《南方文物》2021年第2期,第136页;[日]内田纯子:《商末周初青铜彝器的断代及其制作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152页。

② 《论语注疏》卷2《为政》,《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349页。

尤其表现在占卜用材与占卜方式上。晚商时期卜用龟甲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牛肩胛骨形成抗衡之势——王室占卜多用大卜龟，一般贵族与平民通常则只能使用尺寸较小的龟。^① 晚商时期系统的甲骨刻辞占卜制度于武丁在位期间确立，相关遗存除安阳殷墟遗址，仅见于济南大辛庄遗址。^② 既往研究已表明这些刻辞卜骨大部分属于商王，或与商王关系密切的高等级贵族，包括王室成员、同宗子弟、他族族长等。^③ 此外，由于晚商时期占卜活动流程繁杂，并且在王室政治生活中地位崇高，故而商王甚至设立了专门负责占卜的机构，卜官与占卜用材由国家统一调配。^④ 由此可知，晚商时期的商王及精英阶层开始有意识地实行与平民不同的占卜制度，并在仪式层面空前强化了二者的身份区分。至于这一转变何以发生，笔者将另行撰文阐述。

总之，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式活动，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两处早商都邑内占卜活动的共性与差异，是生态系统、资源获取能力与社会变革形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资源与社会的视角下，对占卜活动进行多要素考察，对不同时间与空间的占卜活动进行比较研究，将深化我们对中国早期国家意识形态与权力实践的认识。

（责任编辑：张梦晗）

-
- ① 参见刘一曼：《安阳殷墟甲骨出土地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7年第5期，第59页。
- ② 参见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济南市考古所：《济南市大辛庄遗址出土商代甲骨文》，《考古》2003年第6期，第6页。
- ③ 参见林法：《从武丁时代的几种“子卜辞”试论商代的家族形态》，吉林大学古文字研究室编：《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8~329页；彭裕商：《非王卜辞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中国古文字研究会、中华书局编辑部合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69页；刘一曼、曹定云：《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卜辞选释与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第297~304页。
- ④ 参见徐义华：《商代的占卜权》，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中山大学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253~255页；李雪山、韩燕彪：《嬗变与重构：商代甲骨占卜流程与卜法制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422~425页。

earlier or with stronger economic foundations, and in cities with higher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FTZs improves local government fiscal balance by optimiz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omoting economic agglomeration. These findings not only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the economic and fiscal development of pilot FTZs, but also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practices in non-pilot FTZs.

【 Keywords 】 pilot free trade zone; fiscal balance; business environmen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Resources, Society and Ritual Choices: A New Study of Divination Activities in Early Shang Capitals

Zhang Fei

【 Abstract 】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key elements of divination activities at the two early Shang capitals of Yanshi Shangcheng and Zhengzhou Shang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s and society.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selection of materials for divination at both capitals wa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by the sites'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and was also constrained by the ecosystem of the time. Both capitals maintained synchronicity in the evolution of divination methods and exhibited a high degree of uniformity in operational procedures. However, these method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from those of the Xia Dynasty. Spatial observations of divination sites reveal that the functions or purposes of divination within the early Shang capitals were highly consistent, displaying a pronounced economic orientation, a characteristic that had already emerged during the Xia Dynasty. Divination activities within the early Shang capitals were constrained and shaped by the ecosystem, resource acquisition capabiliti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dynamics, serving a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early Shang society.

【 Keywords 】 early Shang capital; divination; resource acquisition; social transformation; ritual choice